

蜂农周正龙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刘雪妍

这就是周正龙口中那箱很好的蜜蜂。

土坯房孤立在深山中，被上百蜂箱环绕，只闻蜂鸣，不见人影。记者刚轻声嘟囔一句，怎么箱口没看到蜂，身后就有人大声说，“这里面可是千军万马！”那是浓重的陕南口音。摘下网上网罩，眼睛细长，鼻尖唇薄的这张脸很好辨认——毕竟，周正龙曾频频见诸媒体。只是，他头发花白了许多，有些老相。华南虎仿照风波过去12年，“周老虎”化身“周蜜蜂”。

镇坪大巴山，所有山头，这位老猎人都熟悉如同掌纹，一草一木，陷阱巢穴，全部心中有数。如今，养了40年的蜂，终于成了猎人周正龙的谋生之道。

相比老虎，蜜蜂虽会蜇人，但随处可见，带来的实惠也更多。周正龙一边开蜂场，在淘宝上卖蜜；一边教贫困户如何养蜂，也帮他们销售。

64岁，这个执拗的人，仍在最熟悉的山里折腾。

巴山深处

“去镇坪？周老虎家？”在安康市区找车，这是司机的第一反应。

人口仅6万的镇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，四面环山，地处鄂、渝、陕三省交界处，虽被称为“国心之县”，但平镇高速还未贯通，从安康市区坐车过去也需4小时。

2007年，因华南虎照片真伪之争，周正龙堪称那一年全国最著名的农民。当年10月，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，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村民周正龙拍摄到了野生华南虎的照片，这证明野生华南虎在中国没有灭绝。不料，质疑声迅速出现，一个个证据从网络涌向传统媒体。2008年6月，陕西省政府新闻办正式公布：“照片中的华南虎”是纸老虎。不过，周正龙本人多年来仍坚称并未造假。



周正龙在改蜂箱，他的蜂箱大都是自己做的。

周正龙边说边笑。山里狗熊多，能嗅着蜂蜜而来，“它很笨，走路相当慢，70年代我打的黑熊不要太多，三百多斤。论打猎，我算最狠的，县城的房子就靠当年打猎盖起来”。

在山林里，这位喜欢穿迷彩服的老猎人，即使扛着蜂箱、躬身走路，那步子，一般人都跟不上。

不过，两天前被木桩子砸了脚，轻易不休息的他在床上躺了半天，“全身那个疼，动不动不了……”老猎人，终究还是老了。

传播之道

“你工资高不高？”刚有空坐下抽烟歇会儿，周正龙问的第一句话就非常直接。

不知是性格使然，还是因为有过多次打交道经验，他在媒体面前表现得游刃有余。“我告诉你，写报道最主要的是标题。”他笑着说，“我给你说个标题，‘中国最苦的农民是周正龙，60多岁了还在继续带贫困户’，这个点击量绝对好多万。”

周正龙的确实传播之道。去年，他的蜂蜜在电商平台上架。店面没什么装饰，照片里的蜂蜜也只是装在塑料瓶中，透着一股粗糙的原生态质感。产品介绍写着“真假自由检测，公道自在人心”。周正龙的黑白头像分外惹眼。

“我的销量一直很好，云南、山东的人都来找过我，去年签单太多，发不出货，一天退了700多单。”周正龙说这数字，被周松纠正了——“其实没有一天退700单那么多，那段时间一共退了300多单，而且不只是蜂蜜，还有一些土特产”。

淘宝客服、制作包装、装修店铺都由周松做，“全国包邮，我可赔惨了！12斤蜂蜜快递到新疆，运费就要几十元。”一斤蜂蜜80元，周家这个价在当地倒是不贵，记者去了县城好几家卖蜂蜜的店，售价在每斤70元至120元之间。

周正龙家的600斤蜂蜜，去年销售一空。“蜂蜜也得靠宣传！我这个地方山清水秀，蜜蜂飞到哪儿都是花，采百花蜜，镇坪土生土长的药有一千多种，蜂蜜在我们这里叫‘百草药’。”周正龙说。



文彩村周正龙家。 均 刘雪妍 摄

不同于随蜜而居的意大利蜂，习性温和的中华蜜蜂（又称中蜂）善采零星蜜源。在周正龙眼里，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中蜂是秦巴山区的宝贝，“出巢早，归巢迟，最能吃苦”。

“中蜂采蜜你知道要跑多远？最远有5公里，一天最多要跑几十回，把蜜吸到蜜囊里，往眼眼里一吐，喂一下又去采蜜了，它不休息，最后都是累死的，一只采集蜂不到一个月就死了。”讲起蜜蜂，他说自己可以滔滔不绝连说两天。

他主动展示了一箱蜂，一脸骄傲神色。蜜蜂爬满了两面，单这一箱能产几十斤蜜。“这箱蜂好得很，淡黄色的，全是蜜”。按间隔距离细致码好后，他又小心翼翼地盖上盖子。

一天到晚盯着蜂箱，爬高上低，但周正龙满口说不累。前几年没有罗大翠帮忙，背蜂箱、带发电机、搭窝棚、做饭都是他一个人。

“山里不害怕，地方太偏，人都没有。”现在养蜂规模大了，夫妻俩天天经营着都生怕看不过来，特意请人来装3个监控探头。

周正龙叮嘱在树干上安装探头的年轻人将螺丝拧紧，调好角度。为了看清楚每一箱蜂，他喊妻子“拿镰刀来，劈那个沙树”。竹竿绑上刀，又站上高梯，他利落砍掉了挡住视线的沙树枝。

不过，他的口气还是挺大，“我没丢过蜂蜜！连我的蜂蜜都敢搞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”

靠山吃山

周正龙家的蜂场周围只剩下一家人，是住在更高处的一对七旬夫妇。山下有安置房，贫困户可以免费参加技能培训，其他住户均已整体搬迁。

在镇坪县的路边，时常可见“脱贫致富快，全靠产业带”等标语。这里的产业建设围绕着脱贫攻坚，



饲养生猪、野猪、林下乌鸡，发展生态渔业，建设茶园和中药材基地……2016年产业脱贫1471人，2017年全县仍有贫困户1.08万人。

住在蜂场附近的那对老夫妇，为买两袋方便面，要走一天路下山，在女儿家住一晚，又用一天走上山。老太太送了一袋刚摘的香椿给罗大翠，还把叠好的45元钱塞到她手里，希望周松下山给老夫妇带鸡饲料。

“在山上可以喂猪、养鸡、种地，能维持生活，搬下来怎么办？打工也没人要。”在一旁的周松絮叨着。

巴山深处环境好，腐殖质多，是适宜药材和魔芋生长的地方。山上有许多中药重楼，一斤能卖百元，山民挖药材每年就有两三万元收入，而今这些野生药材几乎被挖没了。

按当地标准，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3015元就是贫困户。如今上山干活的人都是贫困户。歇息时他们坐在田旁，吃早上捡的野栗子，笑着把它们塞来塞去，“你吃，你吃”。这种栗子不用炒，入口干涩，后味才有些回甘。

山上原本没路，前年有位名叫夏明辉的老板承包了三四百亩地，才修了路，负责日常管理的杨勇每天开车拉人上山干活，山丘里的坡地并不平整，最大的一片平整地面也就十几亩，大部分都是二亩八分的零散地块。

杨勇请了30多位工人，每人一天130元工钱，还管一顿午饭。“玄参六七元一斤，亩产最多七八百斤，晒干了近四百斤，但山地种植人力成本高，去年种这么多，根本赚不了钱。”杨勇说。

“只要不下雨，5点就起来，干到天快黑，现在60多岁了，还能干几年。”中午给众人做饭的大姐说。

65岁的刘生珍拿起一升的大水壶喝水，她上山干活3年了，“家里老头生病，儿媳妇精神病，双胞胎孙子也大了，钱根本不够用。我们这种家庭，不敢歇……”

靠山吃山，周家在乡亲中算是走得远的。

三全食品荣膺2019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“指定食品”

日前，2019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在京隆重召开，三全食品总裁陈希受邀出席，并发表主题演讲《中国速冻食品的健康与创新之路》，分享对于速冻技术的独到见解和中国速冻食品行业的创新发展之路。

陈希强调，“速冻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保鲜革命，在经历干燥、腌制、罐头等保存食物方式的发展沿革后，速冻首次实现了保存与保鲜的双平衡，即解决了食物保存问题，又确保新鲜口感及还原性。”

近年来，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，中国速冻食品需求呈现出旺盛的增长态势。未来，食品行业的分工将越来越细、合作越来越深入。对此，陈希表示，三全将积极与所有行业同仁携手前行，推动行业创新发展，为消费者奉上更美味、更高品质的速冻食品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依靠过硬的产品实力和市场加持，三全食品被授予“2019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唯一指定速冻食品”称号，旗下多款产品亮相大会宴会现场并受到国内外嘉宾好评。

“夜周庄”全国第二场推荐活动在沪成功举办

4月24日，“依好！夜周庄”——上海人看乡村，游周庄活动在上海成功举办。

江苏水乡周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卫青在推介会上致辞，并介绍了周庄景区发展30年间，在体验空间、项目建设、产品创新和旅游业态等方面的全新变化，以及当下着力打造的“有一种生活叫周庄”的丰富内涵。

“夜周庄”将观赏的脚步从白天延续到黑夜，放慢了的时间给予游客更多机会去感知、体验周庄所承载的精致、开放的吴文化。而今天，当世界的目光交汇于此，会发现周庄之夜并不是一片漆黑与寂静，随着“中国第一水乡”的招牌越擦越亮，越来越多的游客夜泊水乡。

据了解，这是“夜周庄”产品继“万名浙江人游周庄”杭州推介会后的第二场活动，今后周庄旅游公司将继续前往全国其他一线城市开展“一昼一水乡，一夜一周庄”系列专题推介活动。在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时代背景下，周庄积极对接融入大上海，携“夜周庄”特色旅游产品，并推出多条精品主题旅游线，为长三角区域游客展示水乡特色化、差异化、精致化、休闲化的旅游项目，让大家感受到“第一水乡”的新亮点。

周庄旅游全新概念“夜色周庄”，邀请全世界一起寻梦无痕到周庄！

在丹阳写好《解放日报》发刊词

共产党的接管是有区别对待的。在新闻系统的接管中，就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宣传政策。

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新闻出版的作用。1948年11月8日，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》，明确“对于私营报纸、刊物与通讯社，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，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刊物，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，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，均不应采取此政策”。但要区别对待旧有报刊中“有反动的政治背景”的“少数中间性进步的”，既不能“毫无限制地放任”，也不能“不分青红皂白，轻率地一律取缔”。这个文件还点名上海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，是“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，又有系统的反动宣传，反对共产党、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，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报纸，应予没收”。

为了使中共的宣传在上海占据主导地位，党中央决定把原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改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，在上海出版。《解放日报》编辑部在丹阳组建，并具体规划了该报的办报方针、内容、版式，写好了发刊词。当时《申报》是上海出版设备条件最好的，决定在军管和取缔《申报》后，即在该报社原址出版《解放日报》。宣传干部们在丹阳对军管《申报》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一一落实，谁担任什么工作，在哪个房间办公都安排好了。当接管队伍离开丹阳向上海进



战上海

刘统 著

发，途经苏州时，毛泽东手书的“解放日报”四个大字，已经完成制版，准备用作刊头。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动派的言论出版自由；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和保护民族资本家的正当权益，这是党对待旧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。遵照这一根本原则，军管会根据各新闻单位的不同情况，分别采取了接管、军管、管制和支持扶植的不同措施。

接管就是没收其全部资产，停止出版。接管的对象严格地限于国民党的党、政、府、军、队、特、务）独资创办、直接控制的报纸、通讯社。接管工作一开始，就对国民党的《中央日报》、国民党军队系统的《和平日报》（原《扫荡报》）、顾祝同控制的《前线日报》、孔祥熙控制经营的《时事新报》以及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实行接管，立即封闭，没收其财产，归国家所有。

对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合办的、其编辑部被反动派控制的新闻单位，采取先军管，然后分别情况加以处理。对企业的资本，仅没收其中的官僚资本，私人资本仍归原主，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收入，同时解散被反动派所控制的编辑部，重新组织

新的编辑部。对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的处理是比较典型的例子。《申报》被全面接管，由《解放日报》取而代之。《新闻报》经过整顿后，改为公私合营的《新闻日报》。

旧上海的新闻界有一个特殊情况，报纸、通讯社多达150多家。上海虽然大，也没有必要保留这么多的新闻单位。新办的、复刊的和继续经营的新闻单位也容纳不下如此庞大数量的从业人员，只能吸收其中的一小部分。根据党的政策，在安置过程中，根据本人意愿和实际需要相结合的原则，力求发挥他们的专长。有些年纪大的，自愿回老家，政府发给安家费和旅费。有些人愿意自谋出路，发给三个月的工资。有些人外文比较好，在征得他们同意后，安排到外贸、外事部门工作。有些人中文底子好，转到中学去当教员。

还有相当数量的新闻从业人员，愿意继续从事新闻工作。军管会把他们集中起来，送到华东新闻学院学习。华东新闻学院是1949年7月创办的，第一批学员540人，学习4个月，分配到全国各地去了。数量如此众多，情况如此复杂的新闻从业人员，在半年多内得到妥善安置，不管是留的、走的、改行的，都心情舒畅，未发生一

周家的淘宝店，注册了蜂蜜、腊肉、酱菜等20样品类。罗大翠笑着说：“就是镇坪的土特产全都可以销。”刚还眯着眼，嘴角上扬的周正龙突然拉下脸，“谁说只是镇坪的？你多话！”

“正龙这个商标早被注册了，我注册的是‘周正龙’3个字的，网上有好几家都用我的，这不是侵权吗？我让儿子告他们，结果在网上一说，他们就不敢用了。”说到自家商标，周正龙翘起了腿，“国家商标局的局长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你知道他哪个说的？我是国家商标局局长，老周，你早就要注册商标了，我提前给你批下来你好好使用。”

不过，他这话又被儿子纠正了——“商标这事情不是局长给他打的电话，是我们请的西安一家代理公司给办的。”

“持证”带徒

“说话！说话！我这儿信号不好！”接听电话的周正龙语调高了起来，“你听我给你说，听好！现在蜂子多不多？蜂子不多你就莫动它。”

挂掉电话，他叹：“太忙！自己养了这么多蜂，还带了十四五家贫困户，这女的今天打四五个电话了。”

在镇坪，周正龙带的徒弟不少，用他的话来说，“我是持证上岗的”。当地人社部门为推动技能扶贫和社区工厂就业扶贫新模式，办了安康创客学院，给周正龙发了讲师聘书。

周正龙乐意接受聘任。名气这东西，在他看来有利无弊——可以帮自家赚钱，也可以给当地蜂蜜打开销路，还能带贫困户养蜂脱贫。

一直给他打电话的是贫困户朱亮梅。她丈夫丁先平去年开始养蜂，但他们不会侍弄，一个冬天蜜蜂都冻死了。今年开春，负责扶贫的相关部门领导帮他们联系了周正龙。

周正龙的手机确实难以打通。有时山高处会有微弱信号，但大多时候都是无服务状态。周松需要住在山上时，会提前下载好电视剧。年轻人在这里有些无所适从。

但周正龙不觉得无聊，他喜欢守在山上，“我的手机你们都不打不通最好，清静，但贫困户打不通电话就会来找我”。

曾家镇是镇坪的偏远乡镇，蜂场又在曾家镇的偏远村子。为请师父下山，丁先平凌晨3点多就摸黑骑摩托车赶来，一来一回，天光已经大亮。

“他脾气挺大，我老公也拗，因为蜂桶的位置两人还拌过嘴。我就让老公少说话，这是师父，师父怎么说，我们怎么做。”第一次见周正龙时，朱亮梅觉得他嗓门大、性子急，选地址、设蜂桶、讲蜂种，都带着毋庸置疑的语气，“不过他对我们也好，买蜂钱不够，是他借了几千元，还教我们自己做蜂桶。”

一个蜂箱100元，若买泡桐木料自己做，可以省不少钱。

34岁的朱亮梅说话带着很爽快的笑，手上添了几个蜂蜜的包，她还乐，“蜂子也是喜欢我！”

相比周正龙的养蜂规模，她家的14箱蜂显得有些冷清——放在土坡边钉出的平台上，用塑料筐、砖头垫起防蚂蚁，没有树荫的蜂箱被盖上芭蕉叶。家里有3个孩子要照顾，丈夫患尘肺病，婆婆双目失明多年，这些蜂她不敢马虎。

去年底，朱亮梅一家已经搬进安置房，但养了蜂的土坯房一直没闲置，她每天送完孩子就过来忙活。

“她能干，超不过阴历六月就能脱贫。我带她，肯定不会返贫！”周正龙觉得，能吃苦的人一定能脱贫，而自己也愿意为他们奔波，“人都是感情动物，怕听好话。人家来请，我懂这个技术，再忙都要去，每年我还免费给贫困户的蜂打药。”

但若是要帮贫困户之外的人，他就要按小时计费，不对脾气的他会直接撵走。

太阳西斜，蜂声嗡嗡。采访全程，周正龙一直念叨着眼前飞舞的这些蜂。至于他曾一次次讲述的当年是如何擦肩而过的老虎，如今扛起一家生计的他，不再提及。

因为山路要重修，儿子这趟上山给父母送来20天口粮，之后要赶在封路前下山。马达声起，周正龙钻进土坯房，又偏头瞄一眼儿子的车。

老虎御风疾行，无需遮蔽，而他终要俯身入内，回归现实。

件意外事件，没有任何骚乱。

一方面接管、改造旧新闻机构，另一方面还支持进步的民主人士办报。《文汇报》的复刊是一件大事。解放前上海《文汇报》在徐铸成的主持下，是国内代表民主立场的重要报纸之一。由于报道客观，立论公允，受到读者的欢迎，也被国民党宣传部嫉恨。1947年初，徐铸成被陈立夫、吴国桢等人请去吃“鸿门宴”。陈立夫等表示，给《文汇报》投资，让它为党国多做宣传。徐铸成拒绝了收买，1947年5月，《文汇报》就被政府查封。上海解放后，在陈毅的关心下，《文汇报》在1949年6月21日复刊。当时徐铸成说他的心情“无比开朗”，复刊的社论《今后的文汇报》充满了喜悦之情，欢呼解放。

接管上海之后，陈毅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：共产党如何养活上海500万人民？

旧中国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，使当时上海主要工业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大部分依赖进口。如棉纺织业所需原棉的60%，毛纺业所需毛条的全部，面粉业所需小麦的全部，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，卷烟业所需烟丝、烟土的半数以上，上海人赖以生为的大米的半数以上，动力生产所用的80%的燃料和20%的煤等。上海解放后，全市的存煤只有5000吨，粮食储备只有4000万斤，只够上海市民半个月用的。这种情况，华东局领导是有准备的。在丹阳，大家就研究了保障上海供应的“两白一黑”问题，即大米、棉花和煤炭。应华东局的请求，中央从东北、华北调运大量的大米、白面和煤炭，用火车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。国民党败退后，共产党接管到建立政权之间有个过渡期，这期间军管会采取了平价救济的方式，给百姓提供粮食和煤。保障生活需要。

(二十)

连载